

#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作用

隆国强



易安排也显著增多,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0来个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50多个。

治理主体多元。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跨国公司、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如雨春笋般涌现出来,数量急剧增加,影响力迅速上升。

治理行为的强制性较弱。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存在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世界政府,而是以沟通、协调、磋商、谈判为运作方式,主要依靠各参与主体的合作来实现治理目标。世界贸易组织由于具有争端解决机制而被视为“有牙齿的老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执行协定的强制性,但对违规成员最严厉的处罚也只是授权利益受损方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大多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缺乏规则执行的强制性,一个国家违规的主要代价是国际声誉受损。

治理体系具有演进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不断演进的。首先,大多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秉持由易到难、逐渐深化的原则,具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内在逻辑。其次,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不断有新的议题需要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来处理,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出新要求。第三,随着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不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出现相应变化。影响力上升的国家希望修订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历史可以发现,开放合作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国际规则旨在推动、维护和规范跨境经贸活动的发展。这反映了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对世界的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存在诸多不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低迷期,这些不足表现得更加突出,因而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作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变革。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在吸收外资中占比已经超过一半。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贡献了约80%的全球经济增量。但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投票权、话语权分配并未充分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这一革命性变化。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民主化,切实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银行份额的调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改革,拉开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民主化改革的序幕。

全球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要求提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包容性。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本质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经贸规则,导致国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当前,全球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7,收入不平等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国际经贸规则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调整。

一些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方向性选择。发达国家总体上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也面临传统产业空心化的挑战。这本来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结果,但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存在缺陷,其国内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问题,加之互联网推动了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传播,发达国家的一些群体错误地将本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归咎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优势”。近年来,美国一改多年秉持的自由贸易主张,要求进行所谓“公平贸易”,试图将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引到对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欧洲一些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反经济全球化情绪。经济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方向性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碎片化与低效率,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面临的新问题。经过数十年的演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区域贸易安排纵横交错、叠床架屋,加剧了治理体系的碎片化,降低了治理体系的效率和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培育经济动能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信息技术进步、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新情况、新问题也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的关键期,呼唤推进改革的新智慧。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成为共识,但对于变革的目标和如何变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片面坚持本国利益优先的观念和做法只会带来国与国之间更多的矛盾和冲突,合作共赢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应从大局出发,以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寻求共同利益,推动达成共识,负责任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不断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公平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与水平,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处于加速变革的关键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引导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更加公平高效和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待。

坚持合作共赢,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逆转。但也要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声浪与政策取向可能在短期内令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对这种风险要高度警惕、做好预案。应当认识到,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变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是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要不断完善现有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定不移地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例如: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地位,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下新协定的谈判,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成果;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并使之成为长效机制;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出发,积极推进区域经贸安排,坚持权利与责任平衡的原则,尽量照顾各方关切,加快区域贸易安排谈判进程;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等等。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决策机制正在从美国一国主导演变为“集体领导”。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下降,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转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集体领导”,与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一是明确变革目标,即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二是贡献新的理念。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中国将坚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三是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中国30多年开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创新宏观调控、扶贫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通过与国际社会共享经验,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四是贡献中国倡议。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要深入研究各国的共同利益,积极提出国际合作新议题、新倡议。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应着力增强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能力。一是加强对全球经济治理理论的研究,增强提出新理念、新理论和新倡议的能力;二是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提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能力;三是树立信息化条件下新的开放安全观,妥善处理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以开放促进技术升级、制度完善,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四是高度重视全球经济治理人才的培养,畅通人才流动渠道,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国公民到国际组织工作。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自2013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一些学者和机构曾预测我国经济会不断走低,增速将降至5%或者更低。一些西方研究机构和学者甚至再次抛出中国经济崩溃论。但事实是,自2015年第一季度起,我国经济已连续10个季度实现了7%或近7%的增速,企稳态势明显,已进入速度适当、更具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近一段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上调对我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健康增长,原因主要有三点。

优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明显增强。近年来,为了更好地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国主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7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已经占据半壁江山,2017年上半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4.1%;从地区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东中西部地区正在朝着更加平衡、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从城乡结构看,2016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7.4%。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重要转变,经济发展和增长可持续性稳步提升。

加强创新驱动,新经济增长点加速形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传统动能改造升级和新动能成长壮大,技术创新活动更加活跃,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经济发展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例如,随着高铁技术的广泛应用,2016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达2.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一系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应用于经济建设,“互联网+”经济空前活跃,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促进新经济增长点加速形成。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活经济发展潜力。过去一段时间,我国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需求转变,出现了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产能过剩和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扩大投资,不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而且会加剧已有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近年来,我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将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转向供给侧,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社会产品总量没有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产品增加值大幅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作为经济大国,我国经济结构完整、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经济韧性好,抗风险能力强。我国能够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矛盾,相机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和活力。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努力与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健康增长。

(作者为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 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健康增长

徐康宁

## 提高经济效率 便利人们生活 分享经济发展方兴未艾

郭军 陈聪

分享经济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通过一定平台集聚起来、反复使用,以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对分享经济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分享经济模式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2010年前后,随着优步(Uber)、爱彼迎(Airbnb)等一系列实物分享平台的出现,纯粹的无偿分享、信息分享转向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物品使用权发生暂时转移的分享。这一变化,使分享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活力。

从2014年起,我国分享经济迎来“井喷式”发展。伴随“互联网+”战略的大力实施,一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型分享经济平台脱颖而出,得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广泛认可。目前,分享经济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消费的新主角。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分享经济通过细分市场对传统产业的闲置资源进行优化利用,推出了出行分享、住宿分享、二手交易、众包物流、服务众包等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商家、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关系,提高了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也增添了社会生活的的人文情怀。

目前,分享经济的发展方兴未艾,将在行业细分中不断演进,并带动移动互联网发展进入新阶段。分享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如下趋势。一



## 劳动者拥有更多改变职业阶层的机会

# 我国职业代际流动水平大幅提高

朱晨

流动渠道越来越畅通。那么,在当代中国,职业的代际流动呈现怎样的趋势呢?

我们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结合2014年、2015年采集的江苏、安徽、浙江、黑龙江、河南5省15个县(市、区)的调查数据,对1978—2013年间我国职业代际传承和流动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的分析样本包含具有代表性的26778对父子或父女的职业记录信息,并将400多种职业划分为4个特征不同的大类:农民、蓝领工作者、低阶白领工作者和高阶白领工作者。

研究结果显示,近10年来我国劳动者职业向上流动逐渐成为常态。出生在职业层次较低家庭的人,有61%超过了父亲的职业层次。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比例仅有47%。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度从1978—1992年的

6.1%降至2003—2013年的3.7%。这说明,新生代劳动者从事的职业与其父亲职业的联系越来越少,职业代际流动水平大幅提高。换句话说,新生代劳动者的职业选择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到父辈职业和背景的影响,今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比30多年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拥有更多改变社会职业阶层的

机会。另一个发现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女性代际职业继承比例显著高于男性,而且男性职业向上的流动性更高。这种性别上的职业流动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改变:女性职业向上流动水平大幅提高,比父亲职业层次更高的女性比例稳定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快速提高。这可能是之后女性职业向上流动水平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

## 调查研究

职业决定着劳动者的收入并影响其个人发展前景,因而就业问题备受关注,人们希望有更公平的择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职业

的代际流动状况反映了社会的进步程度和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在传统社会,子承父业的现象比较多。在开放的现代社会,社会阶层的大门始终敞开,职业的代际流动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由计划分配制度向市场配置人力资源制度的转型,人们的职业选择更加自由多样,体制机制性障碍越来越少,代际职业